

张诗亚 著

中国教育战略重点问题

教育热点难点透视

湖南教育出版社

中国教育战略重点问题

G52/39

张诗亚 周 谊 著

湖南教育出版社

中国教育战略重点问题

张诗亚 周 谊 著

责任编辑：龙育群 张汉芳 翦开明

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新科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：9.25 字数：180,000

2000 年 11 月第 2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—5355—2260—2/G·2255

定价：16.70 元

目 录

- (1) 第一章 导论——问题的缘起
 - (1) 第一节 战略重点的确立
 - (14) 第二节 战略重点的失落
 - (41) 第三节 反差中的回应
- (64) 第二章 重点错位的发展
 - (64) 第一节 经济优先引起的关系变化
 - (73) 第二节 鸿沟在东西部之间
 - (81) 第三节 跨世纪的动力之源
 - (89) 第四节 互补的平衡
- (99) 第三章 双锋两刃的发展
 - (99) 第一节 “迟发展”的梯度效应
 - (109) 第二节 从西南开发看发展
 - (119) 第三节 经济起飞论的穷途
- (149) 第四章 发展:从恶性到良性
 - (150) 第一节 沿江与沿边之“眼”
 - (163) 第二节 滞后与超前的两难
 - (188) 第三节 走出怪圈
- (203) 第五章 重点的回归

- (203) 第一节 科技优先律
- (215) 第二节 现实生产力的教育转换
- (228) 第三节 普格农职校之路
- (236) 第四节 心中的重点——真正的重点
- (245) 第六章 结语
- (245) 第一节 发展中的教育
- (264) 第二节 教育的发展
- (276) 第三节 回归的战略重点
- (283) 后记

第一章 导论：问题的缘起

中国教育被确立为发展国家的战略重点已经几年了，但是，中国的教育似乎问题越来越多。虽然，到处都在强调要办好教育，但同时，有关教育的抱怨也越来越多，教育的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。特别是，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教育，教育现在处于什么位置，教育有什么问题，这些问题应如何分析，中国教育的战略重点地位是否落实，没有落实又该如何落实等一系列问题，是人们总在讨论然而又难以得到一致见解的问题。我们想在这些问题上谈谈我们的看法，首先是中国教育这个战略重点地位的来历。从其来历，追本溯源，弄清问题的所在。

第一节 战略重点的确立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在如何发展国家、建设国家的问题上，经历了许多波折。首先是：在农村，将

土地分给农民，进行农村土地所有制的改革；在城市，实行公私合营，进行工商业的所有制改造。随后，在农村实行农业合作化、公社化；在城市，实行工商业的国有化。这些是一些具体作法，其发展的战略是什么，战略的重点又是什么呢？

一、发展战略与战略重点

任何国家、任何政府在其发展国家的方针政策中总有其发展战略，在其发展战略中又有其重点，以使发展有纲有目、有条不紊地顺利发展。

从 50 年代以来，农业实行“以粮为纲，全面发展”的发展战略，其战略为全面发展，战略重点为发展粮食生产。在工业方面，实行的是“以钢为纲”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。在重工业里面，战略重点放在钢铁的发展上。

随着大跃进的开展和苏联卫星的上天，农业开始鼓吹放高产“卫星”，粮食亩产千斤、甚至亩产万斤的“卫星”都放了出来，生产似乎一下真的大大跃进了。工业因为“以钢为纲”，全国性的大炼钢铁运动展开了。全国城乡的男女老少都被动员了起来，参加那“赶上英国要不了 15 年”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。工业、农业都热闹非凡，因为它们都在发展战略之中，战略重点又在其中。商业被忽略了，因为闭关锁国的计划经济似乎还不需要它，老祖宗传统的“重农抑商”政策不能说没有一点影响。教育，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领域，又因为“外行可以领导内行”、“知识多的是工人，是农民里头的半无产阶级。”“不大识

字的人，他们知识高”^①的理论，中国教育自然不在被重视之列。发展战略中没有教育，战略重点也就更不可能是教育了。

然而，教育毕竟是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事业，没有教育的经济发展是低速的和可怜的。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客观规律，它已经由中国和世界的实践证明。日本、德国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最快的国家。两个国家都从战争的废墟上重新建立了世界经济的奇迹。两个国家的领导人、学者和老百姓都一致把他们的经济发展归功于教育。

1871年，德国统一时，毛奇元帅把战争的胜利归功于德国的小学教师^②。德国首相科尔也曾多次说德国是靠教育创造了经济奇迹。

日本第83任文部大臣荒木万寿夫^③。曾说：“从明治以来，一直到今天，我国的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，特别是战后经济发展非常惊人，为世界所重视。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可以归结为教育的普及和发展。”^④

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认为：“振兴国家、肩负国家重任的是人。民族的繁荣与衰退，也是这样。资源小国的我国，经历诸多考验，得以在短期内建成今日之日本，其原因在于国民教育水平和教育普及的高度。”^⑤

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，中日邦交的恢复，中国

① 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第454页。

② 钟鲁斋《德国教育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序。

③ 1960年7月19日—1963年7月18日在职。

④ 《日》《日本的成长和教育》帝国地方行政学会1962年版，第1页。

⑤ 转引自梁忠义《战后日本教育与经济发展》人民教育出版社，1981年版，第6—7页。

人开始放眼看世界。要在2000年前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提了出来。在反修防修的革命进行多年之后，经济发展的战略提了出来，四化成了当时发展的战略重点。在四个现代化中，首先应该实现的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逐渐形成了共识。40年的事实使得人们逐渐看到了教育的重要，教育慢慢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。政府也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了。但是，中国教育从不被重视到成为理论上的战略重点，其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。这个战略重点地位就像一个封建社会的少女，要“千呼万唤始出来”。

二、千呼万唤始出来

自从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第13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把知识分子500万与资本家70万并列，正式把知识分子用“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”^①加以界定之后，教育，特别是文化科学教育不再被重视。

1958年，教育界的“拔白旗”运动，教育科学被批判和取消。党的教育方针代替了教育理论，马列的教育论述代替了教育科学，行政领导的决定代替教育科学的研究。教育科学工作者发表的言论或写出的文章与行政领导的意见不合，轻则被打入冷宫，重则被公开批判。

在那之后，文化科学的学习常常被斥责为走“白专”道路，加以批判。一次次的政治运动把教育的地位一步步地贬到社会最低的位置。

^① 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，第484页。

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，教育被说成为“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政”的地方。最高指示说：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。”在这场浩劫中，中国教育蒙受的灾难远远超过其他各个领域。

1976年10月，四人帮被粉碎，中国教育总算是熬过了寒冬。1977年恢复全国高等院校招生统一考试，可算是中国教育大地上的第一声春雷。1978年，科学的春天终于来到了。1978年召开的中国科学大会给中国教育带来了无限的生机。这对中国教育来说，可以说是一股春天的暖流。但是，“乍暖还寒时节，最难将息”，对教育重要地位的理论上的承认，并不是很干脆的，而是经过“千呼万唤始出来。”

1978年，教育科学研究工作才得以重新恢复。经济学家千家驹提出教育投资先行的理论。当时，中国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.6%^①。他指出，这是长期重生产、轻教育，重经济、轻文化的结果。

中国共产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把教育确立为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。1980年，党中央、国务院作出了《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》，要求在1990年前，以多种形式基本实现初等教育的普及。

1985年，《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》提出，“今后事情成败的一个重要关键在于人才，而要解决人才问题，就必须使教育事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一个大的发展。”

在这里，人才是“一个重要关键”，可以理解为有

① 《中国社会科学》1983年第6期第50页。

若干个重要关键，其中之一为人才。这个“重要关键”的关键程度，后一句话作了解释，并且，指出了解决这个“重要关键”的打算，就是使教育事业“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一个大的发展。”

这个决定，已经把教育培养的人才放到了若干个“重要关键”之一的位置上。教育已经有希望在经济发展之后发展。

1987年，《党的十三大报告》提出，“百年大计，教育为本。”

这次，比两年前又进了一步。教育成了“本”，似乎已经比经济的位置上了前。但是，如何“为本”，没有具体说明。不过，教育的位置在向前移，而不是后退。

1988年9月13日，邓小平提出“从战略高度考虑教育问题”。他说，“从长远看，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。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，还要再耽误二十年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他还说，“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，这是非常正确的，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还不够，恐怕是第一生产力。”并且说，以后“要把‘文化大革命’时的‘老九’提到第一。”^①

邓小平的说法很让人高兴，特别让穷教师们一时充满了希望。但是，各级部门并没有具体实行。3年后，全国教育系统的平均工资在全国12个主要行业中排行却由“老九”降为“老十”

1992年，《党的十四大报告》提出，“科技进步、经

^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：《邓小平同志论教育》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174页。

济繁荣和社会发展,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,培养大批人才。”还提出,发展教育“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。”

这一次,教育成了先于经济的“根本大计”,“劳动者素质”成了“科技进步、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”的根本。教育终于在中国取得了这样的承认。不再被置于经济之后,不再是若干重要之一。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,其意义在于教育的战略重点地位得到国家的最高级承认。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。

三、从“教育救国”到“教育立国”

为了报效祖国、建设祖国,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在寻求用教育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。孔夫子历尽艰辛周游列国,培养弟子 3000,贤人 70,是想用教育的方法来报效祖国。董仲舒提出的“兴学校、独尊儒术”也是想用教育来建设祖国。后来的隋朝起用的科举制,也是利用教育来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。而且,这个办法一直沿用了 1300 年。虽然,这些作法有其不足之处,但其以教育来建国或救国的目的是非常明显的,并且是无可非议的。

正式提出“教育救国”的是 19 世纪末的维新派领袖梁启超。在梁启超看来,国家的强弱存亡以教育为转移,推行变法维新靠教育来实现。他愤嫉中国之落后,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,就在于缺乏人才、民智未开、教育未善,要使国家富强,必须从改革教育、开发民智、培育新民做起,从而对教育的作用作了高度的评价。梁启超认为,要救国图强,必须知变法,实

行新政；而变法必须抓住“教育”这个本原。梁启超在变法运动中，始终强调一个“变”字。他说，“凡在天地之间者，莫不变”。他认为法度也是如此。他说，“法者，天下之公器也，变者，天下之公理也”。也就是说，这是规律；而且主动变比被动变要好。他说：“变而变者，变之权操诸己，可以保国，可以保种，可以保教。不变而变者，变之权让诸人，束缚之，驰骤之，呜呼，则非吾之所敢言矣。”“观万国之势，能变则存，不变则亡；全变则强，小变则亡”，这已是“万国蒸蒸，日趋于上，大势相迫，非可阂制”的世界潮流。

梁启超认为，“变法之本，在育人才”。“人才之兴，在开学校”。如果不开学校，“则练兵如不练”，“开矿如不开”，“通商如不通”。其他也“莫不类似”。梁启超认为，“学校昌，才智繁，虽无兵焉，犹之强也”；“学校塞，才智希，虽举国而兵焉，犹之亡也”。“亡而存之，废而举之，愚而治之，弱而强之，条理万端，皆本于学校。”

梁启超的思想在今天看，真是至理名言。凡有识之士莫不惊叹他的远见。他好象看到了后来一个世纪我国发展中的弊病。他的理论在 100 年之后得到了人们的承认。

梁启超的思想是当时的清政府无法接受的，因此未能得以实现。但他的思想影响了一批知识分子，后来的废科举、兴学校运动都明确地表明了要以教育来建设国家和拯救国家的目的。

“教育救国”的大量宣传是在 20 世纪 20—30 年代。一批有志、有识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世界，看

到了德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和胜利的例子，听到了德国的毛奇元帅在1870年普法战争胜利后，把战争的胜利归功于德国小学教师的言论。他们受到了启发，决心回国用教育来拯救祖国。陶行知先生从美国回来。晏阳初先生从法国返国。梁漱溟先生从美国返回。

晏阳初在20年代初联合了一批爱国的教育家掀起了规模宏大的平民教育运动。他倡导博士下乡，与农夫为伍，并亲自实践。

陶行知1922年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，推进平民教育运动并重视乡村教育。1926年，他起草发表了《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》。陶行知认为“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！他教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。他教人吃饭不种稻，穿衣不种棉……”已经到了必须悬崖勒马另谋生路的时候。生路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，来培养活的国民。他认为：“乡村学校，是今日中国改造乡村生活的唯一可能的中心！”“乡村教育关系三万万四千万人民之幸福，办得好，能叫农民上天堂；办得不好，能叫农民下地狱。”

陶行知是希望农民上天堂的。于是，陶行知要“征集一百万个同志，创设一百万所学校，改造一百万个乡村……叫中国一个个的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，和起来造成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新生命。”1926年冬，他在南京晓庄办起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来实践他的宣言和理论^①。

1929年，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办起“平民教育”。他

^①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编：《农村教育的出路》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—2页。

认为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是“贫、愚、弱、私”，“非用教育潜移默化的力量来补救不可。”晏阳初和他的同仁们从实验中总结出了一套以教育推动文化、经济、卫生、政治全面发展的乡村整体改造的理论和办法。他认为，中国当时人口4亿，其中80%文盲。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最起码的基本教育，所以他们的智力和潜力得不到发挥。晏阳初指出，这是世界上最大的“人矿”、“脑矿”。开发“脑矿”的办法就是进行平民教育。他还发明了乡村改造和建设的方法。他把学校教育、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结合起来，进行文艺教育、生计教育、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，培养农民成为具有知识力、生产力、健康力和团结力的“新民”。

晏阳初的学校教育以青年为主要教育对象，设立初级和高级平民学校，生计巡回学校，使农民获得实用技术训练。社会教育是对农民实施公共教育。方法是发行农民周刊，举办“图书担”、巡回文库等。家庭教育采取家长会、主妇会、闺女会、幼童会、少年会等形式。晏阳初在定县的平民教育实验工作长达7年。与晏阳初一起在定县搞实验的有留法归来的孙伏园，留美归来的姚石庵、陈志潜。他们3人分别负责文艺部、生计教育部和卫生教育部。

晏阳初献身中国平民教育并且成绩卓著。1943年，晏阳初和爱因斯坦等人一道荣获“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质贡献的十大伟人”^①称号。

1931年，梁漱溟在山东的邹平县创办“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”，自任研究部主任、院长，倡导乡村建设

^①《重庆日报》1994年7月18日8版。

运动，寻求“改造旧中国，建设新中国”的路向。

1932年，陶行知创办生活教育社和山海工学团。他把杜威的教育理论加以改造，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活教育体系。抗日战争中，陶先生先后在合川、重庆创办国难教育社、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。

20年代初，晏阳初在河北搞平民教育的时候，在广西，雷沛鸿也在为中国的前途而忙教育。

雷沛鸿主张教育的总目标是救国、救民。各级教育的具体目标是：基础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国民的精神文化素质。对外，可以达到抗击外敌、解救国难的目的；对内，达到救助民困、造福民生的目的。他说：“国民基础教育的企图在整个中华文明的改造。”雷沛鸿认为，改造的内容应该包括“改造我们的政治”，“改造我们的经济秩序”，“另行建设新文化秩序”。雷沛鸿认为教育的最低限度的努力是，“减除民众苦难”，“保育民族生存”，“促进世界和平”。雷沛鸿还认为，教育应该有“生长性”、“普遍性”和“现代性”的特点。生长性要求教育与人的一生有联系，自幼到老，所受的教育都应有联系；普遍性要求全体国民都受教育；现代性则要求教育跟上时代潮流，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。

雷沛鸿长期执掌广西教育，他制订了《普及国民基础教育五年计划大纲》、《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开办计划》、《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指导区规程》。这些计划和规定为广西的基础教育做出了贡献，使广西的普及教育收到了显著的成效。雷沛鸿主张，“按照政、军、体三位一体制，实行一所三用，一人三长。其组织形式是按原有的村（街）乡（镇）设校，每一国民

基础学校，既是幼稚教育中心、儿童教育中心、成人教育中心，又是社会自治中心、民团训练中心。”

雷沛鸿还重视高等教育。他亲自创办和领导了西江学院。同样，是为了救中国。雷沛鸿的教育内容首先是扫除文盲。他说，他要“以扫除文字盲，扫除政治盲，以及扫除经济盲为职志”。在民族危难之际，雷沛鸿主张，“救亡”与“救穷”以“爱国教育为灵魂，以生产教育为骨干”。

陈鹤琴也是要以教育救中国的一个教育家。他与陶行知是挚友。1927年，陈鹤琴支持陶行知创办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。陈鹤琴任该校指导员和第二院院长。第二院是幼稚师范院。1940年，陈鹤琴到江西创办省立实验幼稚师范。3年后，学校改为国立。同时增设幼稚师范专科。陈鹤琴主张，教育应该是“活教育”。“活教育”的目标是教育学生做人，做中国人，做现代中国人，做现代世界人。他提出做人的5个条件：健全的身体、创造的能力、合作的态度、服务的精神、世界的眼光。陈鹤琴认为，身体对人的道德学问有极大的影响。身体不健康，对个人是不幸，对国家也是损失。他认为，强国须强种，强种须强身。因此，幼师和幼专的体育都是必修课。陈鹤琴还亲自带领学生开荒筑路、割草翻土、编帘盖屋、种瓜种菜、养鸡喂猪。学生们经过这样的磨练，在后来的几次学校迁移中，效果最明显。几百个女孩子，在兵荒马乱中，冒着生命危险，背着行李，顶着雨雪严寒，步行几百公里，没有一个掉队。陈鹤琴办教育，从1923年在南京创办鼓楼幼稚园起，他还办儿童研究站、民众夜校、成人补习班等。